

演员杜江： 能听到一句“就爱看你演的戏”，好幸福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

就在记者采访杜江的前两天(10月7日),猫眼电影刚刚公布了杜江出演的电影票房累计突破100亿,成为继吴京、黄渤、沈腾、邓超之后又一位百亿票房演员。

这两天有不少亲朋好友祝贺他,杜江都十分感谢、感恩。“但此时,我最想念的是林超贤导演。”杜江告诉记者,上次与林超贤的合作让他学到了很多,也是《红海行动》,给了他一次让观众信任自己的机会(注:杜江在《红海行动》中饰演蛟龙突击队副队长徐宏,影片票房为36.5亿元)。

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中,杜江主演的电影《中国机长》、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烈火英雄》等影片陆续上映,均取得了优异的口碑和票房。在杜江看来,他饰演的这些平凡英雄身上都有一种使命感、一份责任,“是这些平凡英雄滋养了我,同时激发了我作为一名演员的使命感、自豪感。”

►谈角色： 平凡英雄各不相同， 但都有对职业的使命感

与两个多月前相比,杜江饰演并已公映的角色中又多了机长、升旗手这两个职业。从军人到消防员,再到机长、升旗手。谈起这些不同行业的平凡人,杜江最大的感触是“他们都对工作有一种使命感,总是非常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”。

杜江坦言,谈起使命感,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老生常谈。“但在与原型人物聊天的过程中,每当谈起工作,我都能感觉到他们非常幸福,同时有一份责任在。”

杜江说,国旗仪仗队的战士是“冬不穿棉,夏不穿单”,每天重复着相同的训练和任务。可战士们告诉他,每当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天安门广场,每当自己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,自豪感、使命感油然而生。“民航人、消防队员也都一样,只是他们的工作、性格不同罢了。他们都是敬畏生命、有责任心的英雄。”

以上几个角色演下来,对杜江内心触动最大的是“要找到自己作为演员的使命感”。他认为演员是观众和作品中的一座桥梁,演员的使命就是把作品的内核传达给观众,尽可能让观众满意自己的每一次表演。“‘就爱看你演的戏’,这应该是演员最希望听到的一句褒奖了。”杜江说。

►谈表演： 演员不是技术活， 是在表达感受和态度

杜江第一次出演影视作品还是在2007年,转眼间已经12年。从小荧屏到大银幕,一路走来,杜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,走得弯路并不多,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享受做演员的乐趣。

“可以说我没有拍过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角色。”他认为这对于演员来说非常重要。“想想看,如果你不爱、不信任这个角色,还要为他哭为他笑,那该有多可怕。”

谈及表演,杜江多次提起导演林超贤,不仅是林超贤执导的《红海行动》给了杜江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,更重要的是,在那次合作中,杜江看到了林超贤的工作态度。“林超贤导演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做这份工作,这对我非常受益。”

对于《红海行动》中的表演,杜江显得很谦虚。“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,一定程度上是影片美化了我的表演。”

和很多青年演员一样,在《红海行动》之前,杜江内心非常渴望接到一个心仪的角色。“演员有时候很被动,很多时候是需要一次好机遇,去给自己信心,也给观众信心。”在杜江看来,在好机会到来之前,能做的就只有武装自己。不能要求别人改变对你的评价,只能先改变自己。

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。杜江心中,演员的积累来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“演员的工作不是技术活,是在表达一种感受、态度。”而要做到感受生活,就要做一个敏感、内心柔软的人。

“你不知道哪个触动将来会对表演有帮助,但保持同理心,能感受到,而且能够表达

出来,这是演员的工作和成长。”

“当然,这种积累最难的就是当一时间没有反馈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困惑。这时候只能坚持,告诉自己这是演员这份工作的特性之一,这就是演员工作的代价。”

杜江自称在表演上并没有非凡的天赋,他能做到的,只是遇到了好导演、好作品时,不浪费每一天、每一次,甚至每一个镜头的机会。

“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和演员,尤其对于我这样的年轻演员,导演的帮助很重要。演员和导演相互信任,在创作中相互点燃对方,才有可能渡过难关,这也是我克服困难的唯一法宝。”

►谈电影： 自豪电影为特定群体带来了自豪感

杜江毕业后的这十多年,也是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十多年。杜江表示,老一代电影人看他们现在拍电影的条件,就像父辈聊起当下的生活条件一样,无论资金、技术,还是人员素质,今天的条件都远远超过以往。

杜江说,站在演员的角度,他见证了那么多多技术、资金方面的东西,但却看到了无数电影人的兢兢业业、如履薄冰和奋发图强。

在拍摄《中国机长》时,一位民航业的工作人员说,自己做民航宣传工作40年,不如一部电影让老百姓这么直观地了解民航业。

“这当然有恭维的成分,但也让我了解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肩上的责任,尤其是拍摄《中国机长》这样的影片,一定要有敬畏之心,演员代表了背后无数大众不了解的、默默奉献的人们。”

谈及演员这份职业和中国电影,杜江觉得现在自己作为一名演员越来越自豪。“出演这些影片并不是任务,我现在更加自豪地说自己在影片中扮演了升旗手、机长、消防员、军人……”

杜江的自豪感来自“他身为演员为特定群体带来了自豪感”。他回忆说,《红海行动》曾在某海军基地放映,一位战士看完电影非常激动,他说他的家人一直在问自己每次护航去那么久都干些什么,但由于涉密,那个战士什么也不能说。但如今他能自豪地对家人说“想了解我,就去看《红海行动》吧”。

“很多民航人看《中国机长》时流泪不仅是因为情节动人,更重要的是感到一种温暖——感到有电影人在关照他们。他们也更加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。这也是主旋律电影给我带来的骄傲和自豪。”杜江说。

90后欧豪出演《中国机长》讲述中国奇迹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《中国机长》正在全国热映。青年演员欧豪在片中饰演四川航空3U8633航班副驾驶徐瑞辰。

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,副驾驶和机长的区别可能不太清楚,此番做了大量功课的欧豪解释说:“机长的飞行技术以及年龄是要比副驾驶高的,所以副驾驶的主要工作是辅助机长。但这次重庆飞拉萨是属于高原航线,副驾驶的任务就会更重一些。”

此次参演《中国机长》,欧豪最深的感触是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员都配得上“英雄”二字。“在紧急状态下,他们安全地把大家带到落地面上,保护了国家的财产,更保护了人们宝贵的生命,他们就是英雄。”

在欧豪看来,虽然在中国民航界有一种说法是“中国民航不需要英雄,我们需要的是安全”。但是当有意外发生时,需要有英雄存在。

危急时刻需要有英雄， 一心只想如何呈现好人物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第一次听到川航事件的时候,最深的感受是什么?

欧豪:非常佩服英雄机组!在紧急状态下,他们安全地把大家带到落地面上,保护了国家的财产,更保护了人们宝贵的生命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这个事件不只在在中国,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,所以我觉得他们配得上“英雄”这两个字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中国民航界有一种说法:“中国民航不需要英雄,我们需要的是安全”。您怎么看这句话?



欧豪: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。没有人会希望有任何的事件会发生。但是很多时候会有意外发生,这时候就是需要有英雄存在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出演《中国机长》有没有做什么特殊准备?

欧豪:我们有去做飞行培训,了解飞行员的工作是怎么回事。作为一名飞行员,标准是什么,原则是什么,任务是什么。除了了解真实事件以外,需要多和原型人物去探讨,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是什么,才能够把真实的事件、真实的人物还原给观众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的角色是有原型人物的,而且是事件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个,你们之间有没有交流过?

欧豪:我的原型人物是徐瑞辰。我见过好几次,也加了微信。对演员来说,塑造一个真实人物其实是有难度的。因为他是真实存在的,不是虚构的。虚构的人物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发挥,但因为这个事情是真实的,演员就得考量很多的问

题,需要符合真实性。

徐瑞辰是一个丰富饱满的人物,所以我需要多和原型人物去交流探讨,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,他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,这样才能够知道要怎样去呈现人物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在拍摄时一直被风吹,请问一下您的感受?

欧豪:和原型比我们已经很轻松的了,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,所以我倒不觉得辛苦,但是会有压力,如何把这个人物呈现好,这是我比较在意的。

《中国机长》讲述的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在《烈火英雄》里面的角色是一名英雄,在《中国机长》中也是,同样是饰演英雄,如何突破自己?

欧豪:作为一名演员,剧本呈现的角色就是你要完成的任务,不管它有多难,你得去克服它。不管是零下二十度在户外拍落水戏,还是画三个小时的特效然后吹一天风,这都是工作。如果是你的工作,你又爱它的话,就不觉得有多辛苦。我觉得这是很难忘的经历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整个拍摄下来,您认为《中国机长》最能打动观众的是什么?

欧豪:第一是真实性,第二是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一件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我觉得那时候飞机上的一百多人是一条心。而在戏外我们整个剧组也是一条心。所以不管戏里戏外,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这点应该会打动观众。

《中国机长》讲述的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奇迹的故事,我想它会感动每一个人。

演员张译： 《攀登者》中诠释英雄复杂内心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电影《攀登者》正在热映,演员张译在片中饰演曲松林。影片中,张译出演的曲松林和方五洲、杰布三个人共同在1960年代代表全中国第一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。1975年,曲松林担任第二次登顶珠峰队员的总教练。

70后的张译,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。作为一名演员,也多次在影视作品中扮演“硬汉”,英雄形象。

对于曲松林这个角色,张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。特别之处在于“曲松林是个性格上有小瑕疵的英雄”。这也是他此次塑造人物时遇到的一大挑战。

完成《攀登者》这部影片后,张译最大的感触是:“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信仰。”在他看来,人们需要有攀登意识、攀登精神,这正是电影《攀登者》所体现的精神。

我有一种冲动， 迫不及待地去诠释那一段复杂的情感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之前演过很多英雄角色,如何理解曲松林这个角色?

张译:曲松林是个性格上有小瑕疵的英雄,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英雄,只不过是他在他变成英雄的过程当中走了一点弯路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曲松林这个角色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?

张译:曲松林满怀着遗憾,却又满怀着队友登顶之后的那份振奋。在戏中,他站在山下仰望山顶,仰望着看不见的战友的方向,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。作为演员,我有一种冲动,迫不及待地去诠释那一段复杂的情感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拍摄过程中,您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?遇到困难之后是怎样克服的?

张译:遇到最大的困难在于对人物的找寻。一方面是年代背景,因为我没有见过60年代的样子,对70年代的印象也非常模糊。此外,曲松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?这些都需要我做大量的功课。不过,导演和吴京是我最好的智囊团,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在登山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危险就是死亡。作为一个演员,您如何去演绎这种在死亡之前的状态?

张译:我们惯常的思维就是演绎恐惧,要瞪大眼睛,张大嘴去喊叫。但是,在灾难面前,大

多数人的真实反应是“木讷”。在演绎人物遇到灾难时,更多的是下意识的自救,甚至来不及表情。

攀登精神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在拍摄过程中有一部分戏您是赤脚拍摄,这种寒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

张译:那些冰的体感温度可能是在零下二三十度,当你脱掉鞋子时开始有点冷,因为风很大,脱掉袜子的时候,就开始彻底变得很冷了。

当你把脚放到雪上一刹那,它不是一根针在扎你,也不是一堆针在扎你,好像是有几把刀子划你的脚,划你的脚心。一开始的几秒钟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大概超过十秒之后就站都站不住了,但是作为演员还是要把戏演完。

在导演喊“卡”之前,你没有权利蹲下、躺下或把脚离开雪面。导演喊“卡”之后,我直接就摔倒在地,把脚抬起来,那种疼是钻心的,是喘不过气来的疼。但是我要感谢演员这个职业,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历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在登顶的过程中,队员之间相互帮助,甚至拼上性命去救对方,您怎样理解这种团队精神?

张译:我和几个刑警朋友聊过天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好?他们说因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,自己的后背、性命都是交给另一个刑警的。

登山的时候也是这样,我们叫做结组,四个人或者三个人为一个小组,他们的绳子是绑在一起的,有一个人掉下去,另外三个人要把他拽起来,如果不拽他,可能另外三个人也要被拽下去。可以说大家的命是绑在一起的。所以尤其在那种恶劣、极端的条件之下,队员必须互相救助。

登山不仅仅体现的是攀登精神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团结协作的精神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无论是1960年或者是1975年,那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并不好,在这种背景之下,这群人还要坚定地攀登珠峰,您是怎么看的?

张译: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信仰,攀登珠峰就是一种信仰。

攀登珠峰体现了一种攀登精神,它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尤其是在困难时期,越需要我们全民团结在一起,努力往上走。成功攀登珠峰对当时的民众有很大的振奋作用。

《攀登者》主演胡歌： 攀登是一种修行

■文/本报记者 赵丽

大约在一年前,在岩井俊二的镜头中,小酒馆里的一个满脸胡须、落魄、颓废的中年人吸引了观众的目光,很多人惊叹于这个男演员对角色的塑造力和情绪爆发力。当镜头扫过演员的正脸,大家猛然发现,那个眉清目秀的演员胡歌,已悄然间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转身。

自《你好,之华》开始,睽违大银幕多年的胡歌开始在电影界发力,在刁亦男执导的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中饰演“亡命之徒”周泽农,在陈可辛的《李娜》中饰演李娜“背后的男人”姜山。而在9月30日上映的《攀登者》中,胡歌饰演了1975年首批备战攀登珠峰“小三侠”之一的杨光。

与张超、周泽农相似,杨光也是一个命运大起大伏的人。作为登山队的一员,他遗传了父亲的马凡综合征,这是一个“参加运动相当于和死神做游戏”的罕见病。而他努力攀登珠峰就是要改变父亲“后悔让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”的想法,想让自己成为父亲的骄傲。

除了证明给父亲看这一点点“私心”,杨光选择挑战珠峰的最主要原因,还是身上的“使命感”。谈到对角色的理解,胡歌表示,那时的登山和我们现在理解的登山不太一样,现在大家更多是挑战自我,而那个时候“攀登者”们身兼了非常重要的国家任务,所以攀登过程中每个个体都是放在最后的,集体利益永远在第一位。

由于题材的原因,《攀登者》的拍摄过程异常艰苦,但曾经亲身登上6000多米的启孜峰的胡歌,在登山方面有着一定的经验。“在整个登山的过程中,人在这种极限的环境下,你如何去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在和外部的险恶环境做抗争的同时,其实你也在和自己的内心做抗争。”

拍摄完《攀登者》,胡歌对于登山,对于珠峰,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。胡歌说,人们都说每一座高山都代表了一个神,我想每一个攀登者也都是一个修行者。希望观众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入影院,共同经历这一场不简单的修行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是怎样理解片中这种舍身性命去救队友的品质及团队精神?

胡歌:我觉得团队精神的一个前提是说最重的是任务,而不是个人的安危,或者说是一个人得失。我看了相关的资料,在1960年和1975年

这两次登山的过程中,其实有很多舍己为人的事迹。我觉得信仰很重要,因为对于当时的登山队员来说,他们登山其实是国家任务,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去攀登珠穆朗玛峰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咱们国家1960年或者是1975年的时候条件是非常差的。您觉得在这种条件之下,支撑他们去攀登珠峰的是什么呢?

胡歌:心中有信仰是党和国家选择了他们,他们是为了党和国家去攀登珠峰,这是第一。第二我觉得也有对自己的挑战,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面,一个是对于人生理想的考验,还有一个是对自身情绪的控制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杨光在病床上时,说出了“珠峰离天上最近,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”这句动人的台词。您认为在面临可能到来的死亡时,杨光的心态是怎样的?

胡歌:可能大部分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还是恐惧吧,但我相信所有参加登山队的队员在那个年代,在那个环境里,他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和普通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对于死亡应该是非常坦然,非常镇定。只有在那种没有恐惧的前提下,你才能够专注于登山,专注于你所踏出的每一步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拍摄这部电影之前,您有没有做过哪些专业的训练或者前期准备?

胡歌:我在进组之后和我们这个专业的指导一直在沟通,因为他也知道我之前登过山。所以在一些技术动作上,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讲解。更多的是我和他了解了更多作为登山队员,他们的一种心理、心态、他们的经历,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塑造角色会有帮助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您觉得演了这部电影后,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或者对您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?

胡歌:让我更了解珠峰了,也让我对登山这件事儿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。我们以前可能对于登山的最初步的印象就是征服,征服高山,征服自然。拍完这部戏以后,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征服的,并不是说我们登上了珠峰就是征服了它,而是它接纳了我们,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